



史学家约瑟夫斯 及其世界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英〕泰萨·瑞洁克 著
周平 译



商务印书馆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英〕泰萨·瑞洁克 著
周 平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 / (英)瑞洁克著;周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10150-9

I. ①史… II. ①瑞… ②周… III. ①约瑟夫斯(37~100)—人物研究 ②犹太人—民族历史—研究—古代
IV. ①K833.825.81 ②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7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

[英]泰萨·瑞洁克 著

周 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978-7-100-10150-9

2014年2月第1版

开本 705×1000 1/16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8.25

定价: 35.00 元

Tessa Rajak

Josephus,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ciety

© Duckworth, 2002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中文本根据达克沃斯出版社 2002 年版翻译

英] 著 泰 [英]
著 克 [英] 著 [英]
著 平 著 [英]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年 4 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再版前言

再版序言

缩略语

大事记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第五章 犹太教派的组织结构

第六章 约瑟夫斯与加利利内战

第七章 作为阿拉米语作家的约瑟夫斯

第八章 非犹太学派的庇护及犹太爱国主义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附录 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

初 版 前 言

本书不是对约瑟夫斯及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社会的一般性介绍,而是对该作家的史学著作及其战争描述的重新解读。这本著作不仅考虑研究者的需求,也顾及那些对该时期没作过专门研究的读者的需求。因此,我一方面对作者所陈述的论点作了详尽而充分的(但愿我没有言过其实)文献引证,同时又将原始文献译为英文,并对读者所不熟悉的概念(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希伯来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对于不规则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或阿拉米文,我则基于简单的语音原则,音译为英文。

长久以来,我都承受着他人的恩泽。倘若没有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的视野及其忠告与鼓励,本书难以成文。他还对本书数稿的不同章节作了评述。感谢阿兰·沃德曼(Alan Wardman),他不仅在内容和文体方面对提升本书的水平作出了贡献,并且慷慨帮忙校对书稿。非常感激牛津大学博士生论文主审教授彼得·布朗特(Peter Brunt)和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他们细致而敏锐地纠正过我博士论文中的许多错误,而此书正是我在博士论文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的结果。我还要感谢戈泽·弗姆斯(Geza Vermes)、阿纳尔多·摩米格利西诺(Arnaldo Momigliano)和米瑞埃姆·格里芬(Miriam Griffin)的支持和他们的建设性意见。感谢我父母的帮助和他们对此书持续的关注。感谢我的丈夫哈里·瑞洁克(Harry Rajak)敏锐的批评以及他对我的关爱,本书的出版见证了他对我的爱。

此书最终完成于华盛顿特区希腊研究中心。我必须感谢哈佛大学董事会,尤其是其研究中心主任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他主持的研究中心环境安静,让人充满写作激情。雷丁大学允准的一年的学术假及福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都使我获益匪浅。

犹太文化纪念基金会和沃尔森基金会也分别资助了此项研究。多琳·詹尼斯(Doreen Janes)不厌其烦地为我打印了这部很难辨识的手稿。我的出版商则耐心地等候我完稿,之后又精心地出版了这本书。

泰萨·瑞洁克

伦敦,1982

再版前言

感谢我的出版商吉拉德·达克沃斯出版社(Gerrald Duckworth & Co., Ltd),是他们建议将我1983年出版的《约瑟夫斯研究》修订后再版。这让我有机会改进并更新这部著作的内容。全书正文仍保持原样,因为此书对有关约瑟夫斯众说纷纭的个人生涯和写作等重要问题的处理至今仍然中肯而正确,这本书在过去20年里拥有大量读者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本书得以再版的前提。原版正文和注释中的个别错误列在《再版前言》之后。在第一版中,浩繁的参考文献注释均为脚注,而再版则在此基础上于正文之后增添了独立的“参考文献”部分,并在书的末尾列出了自1983年以来重要的相关出版物。新撰写的“序言”部分就目前约瑟夫斯研究中普遍关注的、尚未形成定论的观点,以及本书对其中的若干著述进行的探讨,在新近研究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一些讨论。

我在第一版中已经感谢过许多人,此时我还想在丈夫的姓名旁边加上孩子保罗(Paul)与黛娜(Dinah)的名字,孩子们给了我在1983年还没有能力给予的支持和鼓励。非常感谢我新近获得的两项资助,这给了我时间和物质条件,能够在理想的环境中重新回到约瑟夫斯研究中心去熟悉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为此我十分感谢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高级研究所,感谢杰出的2000—2001年希腊化研究组的组织者戴维·萨特兰(David Satran)和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让我在2002年4月至5月期间在该研究所工作;感谢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大学古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热情好客的主任阿兰纳·诺布斯(Alanna Nobbs)和萨姆·利尤(Sam Lieu),以及热心的秘书帕特·盖丹斯(Pat Geidans)。感谢雷丁大学欣然同意给我假期,感谢系里的同事们在我离校研究期间出色地填补了我的工作空缺。感谢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的克莱尔·菲尔珀茨(Claire Phillpotts)和麦考瑞大学的诺曼·里克勒夫斯(Norman Ricklefs),他们协助我出色地完成了本书“参

考文献”的准备工作。还要感谢达克渥斯出版社的戴博拉·布莱克 (Deborah Blake) 无出其右的热情和超人的能力。我谨以新版纪念我的父母,《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能 20 年长盛不衰,这想必足以告慰二老。

泰萨·瑞洁克

2002 年 4 月

再版序言

21 世纪约瑟夫斯研究

一千多年来,史学家约瑟夫斯拥有无数的读者和评论者。评论认为,他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独特时期和地点——整个公元 1 世纪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希腊化和罗马世界——的犹太社会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犹太人也许曾在数百年中将他忽视或遗忘,把他拱手让给多为基督教徒的读者去欣赏和喜爱;但无论人们出于什么目的,总在对约瑟夫斯评头品足、深研细究。然而,在 1983 年此书初版问世时,人们对约瑟夫斯的研究还停留在浅层次,研究范围也相对狭窄。在过去的 20 年里,一切都改变了:约瑟夫斯研究专著、专门研究、评论和介绍、学术研讨会和研究报告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应该是以史蒂夫·梅森(Steve Mason)为主编的布里尔出版社(Brill),该社出版了主要的相关翻译和评论(此处所提及的文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本书末尾“参考文献”中“学术研究文献”部分)。这种变化可能有着各种不同的缘由,很难说我对这有何特殊的贡献。但值得欣慰的是,在 1988 年出版的、学术价值极高的皮尔·比尔德(Per Bilde)的约瑟夫斯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中,本书 1983 年版在突出的位置被列为史学家约瑟夫斯“现代”(以区别于“古典”)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所谓“现代”研究,是指将史学家本身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而作的研究,这确实是此书所寻求的目标,也是 1988 年以来大多数约瑟夫斯研究追求的主要目标。

迄今为止,约瑟夫斯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而这本著作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趣的是,本书两个版本之间的跨度与约瑟夫斯的《犹太战史》(*Jewish War*)及其后他在《自传》(*Life*)中再次描述这场战争的时间跨度几乎一模一样,约瑟夫斯以重新讲述大部分故事的方式来应对大众对其

作品的反响。本书再版时几乎没作任何改变,这说明我对自己早期研究中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内容的认可。此外,在参加无论是在欧洲、以色列、加拿大还是美国举办的各种约瑟夫斯研讨时,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我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然争论激烈。即使从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视角来解读约瑟夫斯,也要求我们的研究一方面考虑到约瑟夫斯本人高度参与了他所描绘的犹太战争及其前因后果;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史实与叙述那场战争时人为地渲染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他所描述的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我们仍在寻求解读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他在《犹太战史》和《自传》中有过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必须对其中的“省略”部分,尤其是与宗教教义和支撑公元66年至73年那场叛乱的各种经济势力相关的“省略”内容作出解释。对他描写犹太统治阶层与那场叛乱的关系时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使我们不再认为绞尽脑汁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明智之举,也仍须进行研究;并将这些自相矛盾看作他的一种辩护——不仅仅是为他自己,而且为自己试图跻身其中的更广泛的犹太群体。关于罗马帝国庇护他的细节,我们需要仔细推敲,正如对待其他古典作家一样,我们必须适应作者在修辞和写作风格上给我们制造的麻烦。

本书重点研究了约瑟夫斯的政治、军事和道德生涯中的重要时刻,以及他最著名的作品《犹太战史》,力求将历史事件与其发生的环境联系起来,而环境本身也需要我们去研究。研究领域起始时总是很广阔,继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约瑟夫斯研究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研究的主要问题,毫无例外都是在1983年版本中以必要的简短形式提出并讨论过的问题。但愿我的研究能够引导读者敏锐地定位及解释这个领域,并能将研究继续深入下去。在逐渐接近问题关键的过程中,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对我的结论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异议,读者可以权衡选择不同的解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夫斯的早期生涯。史蒂夫·梅森的一篇写作严谨、口碑甚佳的研究文章不仅坚信——正如其他人一样——约瑟夫斯关于他在青年时期就与据称占统治地位的法利赛人关系密切的说法(这是我认可的观点)不过是事后编造的谎言,从根本上不足为信,而且认为那些说法的目的绝非意在传达严肃的宗教含义。约瑟夫斯所指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政治关系。还有,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在一部围绕着解读犹太战争的、内容广泛的历史研究中,再次考察了犹太人的派系和犹太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结合针对当代犹太人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新见解他明确认为,统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失势派别可能都全身心地支持起义,尽管约瑟夫

斯的说法恰好相反。我对这场叛乱提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解读因此受到攻击。乔纳森·普莱斯(Jonathan Price)对犹太首领们在围攻耶路撒冷战役中行为的评价与古德曼观点一致,并对约瑟夫斯过分详细地记载围城中的自愿出逃者这一细节表示质疑。而对于这部分内容,我基本上认可作者的描述。

其他学者如今已经开始研究我在1983年时仅仅提及的一些领域。当时我试图强调约瑟夫斯字里行间表露出的、隐藏在犹太叛乱之后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的信息,将这些信息与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nton)对犹太叛乱之后其他革命模式的分析,以及埃里克·霍布斯博姆(Eric Hobsbawm)关于现代匪帮首领在当地的统治地位的前沿研究联系起来。然而,从比较研究的视角,真正提供了这项研究所急需的、公元1世纪犹太农民状况的调查,则是理查德·霍斯里(Richard Horsley)的系列著作,以及塞斯·施瓦兹(Seth Schwartz)和布伦特·肖(Brent Shaw)的标志性文章。

近年来,约瑟夫斯研究更强调学术性,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人们曾对约瑟夫斯是否诚实的问题一直抓住不放,这种好奇心现在似乎有所减弱。这是任何约瑟夫斯研究著述都回避不了的问题——至今仍然如此,也是我觉得有必要为一个常常被轻率地恶意中伤的作者辩护的问题。不过人们现在至少已充分理解,真实程度不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作品的唯一标准,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借用史蒂夫·梅森的用语,“侦探史学家”(detective historians)大行其道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发展使人们愿意沿着我试图开创的道路进一步前行——不仅将约瑟夫斯讲述的其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作为重构历史的佐证,也将他浩瀚的、充满魅力的叙事本身视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对约瑟夫斯作品的不可避免并显而易见的偏见,就成为约瑟夫斯研究中一个有趣的特征。

如今学术研究中不断增强的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引导人们作了一些有趣的尝试。例如前不久詹姆斯·麦克拉伦(James McLaren)的实验。他似乎不能满足于约瑟夫斯是我们“已知”的大多数史料的唯一来源的局限,于是,试图绕开并以某种方式超越约瑟夫斯叙事中超乎寻常的主观陷阱。他希望对导致叛乱的单个的历史事件进行所谓独立的、现代的重构,系统地、分别地描述约瑟夫斯的叙事结构和选择性。他提醒我们要警惕约瑟夫斯写作时受后见之明的影响,出于特殊需要而将叛乱前60年左右的本土形势描写为长期动荡不安,危机不断升级。无论我们对他的成果作何判断,麦克拉伦的方法指出了研究老问题的新目标和新视野。

基于许多学者在解读约瑟夫斯历史事件构建中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很可能被引向解读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问题。1983年,我试图将两个问题交叉讨论,并在其中找到平衡点。我们现在可以将经过20年精心研究之后最终以飞速的步伐呈现于世的、有关犹太宗教派系和非派系的、极为丰富的库姆兰文献(texts from Qumran)考虑在内。在这场信息革命出现的同时,我们现在比过去几代学者更加重视犹太启示思想的多样性。这些资料展现了当时犹太文献中最困扰人们的因素,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的存在。因此,在我对约瑟夫斯的解读当中,有一个方面我希望能专门定义,或至少指出它与其他方面的细微差异,那就是约瑟夫斯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高度理性化的描写。丽贝卡·格雷(Rebecca Gray)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我们无需假定约瑟夫斯对于他公开宣称的先知使命抱着完全不信的态度,正是这一使命使他在尤塔帕塔城(Jotapata)免于随众人一起集体自杀的厄运。此外,约瑟夫斯时常表现出对某种魔法的兴趣,他似乎对预言家的能力深信不疑。我们不必因为他曾高声讨伐叛乱团伙的预言及其奉承者和假先知等,就认定他讨厌各种预言思想。比如曾使他臭名昭著的、宣称天命暂时转向了罗马统治势力一边这一点,就证实了他看待预言的立场。

比起对早期犹太教的描述,我们对罗马帝国的解读也许没有理由进行重大修正,然而,改变仍然是有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焦点,即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罗马东部行省所发生的复兴希腊文化与罗马化影响的融合。约瑟夫斯的整个人生和事业都取决于罗马势力,他亲身见证了犹太人同希腊语言及思想长期共存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他必须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希腊语作家。现在我们比从前更理解这一点,即约瑟夫斯的写作活动就是长时期文化交融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特征各异、反差明显的两种制度的混合。在本书初版问世至今的岁月中,我曾在若干篇文章中阐释了这个问题。在约瑟夫斯研究与这个问题最具相关性的是对《犹太古史》的理解。对于《犹太古史》,读者们现在可以得益于路易斯·斐德曼(Louis Feldman)非常专业的眼光,在他不知疲倦的精神指引下,去观察千变万化的犹太希腊混合文化(Jewish Greek mix)。同时,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明了的是,约瑟夫斯的文字,即使是《犹太战史》——此书写作时约瑟夫斯刚离开耶路撒冷不久,也不能代表仅仅是包裹在希腊文化外衣之下的纯粹的巴勒斯坦犹太文化。本书中不时出现的犹太—希腊二分法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令人信服。相反,现在我们可以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对希腊—犹太文化传承的新认识终将使那些无所不在的、凭空想象的约瑟夫斯的写作助手化为乌有,因为至今人们仍然广泛地认为约瑟夫斯的作品是由他们代写的。对于这种言论,我

的《附录Ⅱ》似乎并没有起到致命的打击作用。

曾经盛行的、将约瑟夫斯表现为罗马帝国吹鼓手以及来自弗拉维家族的救命恩人的走狗的问题，是我的研究符合逻辑的必然起点。幸好这个鲁莽的假设如今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妨碍我们了解约瑟夫斯本人对事物的立场。显然，文献研究者们对恩主影响问题采用了更为细致的研究方法，使人更容易对约瑟夫斯的依从关系及其他的义务建立起准确的认识。尝试维护约瑟夫斯坚持为提图斯(Titus)所作的辩护——认为焚烧耶路撒冷圣殿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这种也许是异想天开的做法能否让更多的人接受呢？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然而，约瑟夫斯本人作为罗马人在罗马的情况至今仍是一个谜。梅纳赫姆·斯特恩(Menahem Stern)的研究表明，他几乎可以肯定《犹太战史》的第七卷，也就是最后一卷(这一卷与其他几卷有明显区别)的写作年代不是提图斯统治时期，而是图密善(Domitian)时期；而后者与约瑟夫斯的私人关系不如前者，也许从未做过约瑟夫斯的庇护者，但他的研究同样不能揭示约瑟夫斯的罗马生活情况。古德曼曾大胆尝试填补约瑟夫斯在罗马生活的学术空白，尽管篇幅不长，但颇具启发性，约瑟夫斯著作的日文译者秦刚平(Gohei Hata)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推测。塞斯·施瓦兹在一本书中构建了战后的犹太政治场景，尤其是大祭司在战后的命运，以及约瑟夫斯在其间的地位等。通过这种方式，他提出将《犹太战史》与史学家后来几部著作中的僧侣情结联系起来。我们对《犹太战史》的理解在无数细节上都极大地受益于约瑟夫斯其他著作中的内容。过去20年中，我们对《犹太古史》的研究也有了显著进展。《犹太古史》是一部趣味无穷、简明扼要的作品。其主题与《犹太战史》有重复之处，而在为犹太文化辩护的主题上则与《驳阿皮翁》(*Against Apion*)也有共同之处。格雷戈里·斯特林(Gregory Sterling)将所有约瑟夫斯的作品归入一个新的文学类别，即所谓的“护教性史编”(apologetic historiography)，这是一种通过解读约瑟夫斯作品来阐明他的思想的连续性的方式。这也许清楚地表明，恰当把握《犹太战史》的最佳途径就是熟悉和了解约瑟夫斯的全部作品。

约瑟夫斯与更广泛的犹太流散区也有过不少接触：他在巴比伦出版其《犹太战史》的初版，即阿拉米语版(Aramaic version)；他曾在地中海居住区收集资料并在那里娶妻；他甚至还可能返回过巴勒斯坦，去照看他在那儿的新地产。约瑟夫斯在失去从前的世界后，是否找到了一个可以部分弥补损失的新天地呢？或者继续生活在一个孤独的旧时代，并作为一个犹太历史的记录者，埋头于他赋予自己的使命之中？这一切都还和我最初写作时一

样扑朔迷离。与他的著作以后被踊跃接纳的历史盛况相比,关于他同时代的读者对其作品的接受程度如何我们知之甚少。

我们自己也是进行中的历史解读的一部分,这项事业现在已进入成熟而激动人心的阶段,而且这一趋势将变得更加明显。约瑟夫斯作为一名犹太历史学家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我不揣冒昧地推测,不久的将来,我们目前对约瑟夫斯历史故事的研究,将会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与罗马相关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行列。《犹太战史》重要的思想内容属于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研究的范畴。除了我们熟悉的希腊和拉丁史学的文体特征外,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各种修辞及反讽手法的熟练运用,看到了希腊戏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个别场景和某些悲伤时刻,而且还表现在内容结构和充满魄力、使人身临其境的场景描绘上。所有这一切在约瑟夫斯的作品中都有精彩的例证,浓缩于他描绘的伟大场景中:耶路撒冷被围困和陷落、罗马攻陷犹太卡普塔(Judaea Capta),以及最后出现却不可忽视的马萨达(Masada) 73 人在城堡陷落的最后时刻集体自尽的场面,这个既令人震撼又令人费解的场景掀起了《犹太战史》最后一卷的高潮。

今天,马萨达守城军民自尽的场面也许是约瑟夫斯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幕。近年来,人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个场景进行了精心研究。在对这个场景描写的讨论中,活跃着众多关于约瑟夫斯大量编造谎言的论点。这些论点也许会由于当今的以色列问题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传播。对“马萨达之谜”这个民族神话相关的纪念地以及对该事件的学术解构,都激发了对《犹太战史》中这个被神化了的故事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较有根据,另一些则不然。亚丁在 1964 至 1965 年间的发掘成果终于以几大卷的篇幅出版,尽管姗姗来迟却十分杰出。它引发了对约瑟夫斯所讲故事的真实性的新一轮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起义据点文物发掘和约瑟夫斯文字的比照。在讨论中,文物发掘者受到的批评并不少于约瑟夫斯。对约瑟夫斯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书中仅以讨论作者写作目的的形式出现,但至今并未得到解决——对于最后一批可憎的反叛者,约瑟夫斯原本一直不停地责难,可最后却高调描写并颂扬他们,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十分有趣的回答。解答者在约瑟夫斯的话语中识别出典型的约瑟夫斯式潜台词,认为约瑟夫斯似乎在明褒实贬。另一种思路认为,约瑟夫斯对“马萨达事件”的描写是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由于希腊—罗马文学中描写失败的蛮族英勇自尽场面的传统手法可以信手拈来,从而鼓励约瑟夫斯仿而效之。有人会说,这种解读方便有利,回避了任何有关作者是否真正同情叛乱者的问题。

马萨达的故事至今难以盖棺论定，这也许标志着约瑟夫斯在用他极具表现力的文字与读者巧妙周旋的能力。尽管这场辩论充满活力，提出了多种可能性，但与从中受到的启发相比，旁观者更多的是因其不确定性而倍感困惑。不过他们有一个脱困的突破口：即回到《犹太战史》本身去发现约瑟夫斯写作中的问题和特性——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阅读。在任何情况下，现代的文献解读方法，无论新方法还是老方法，都不能取代作品阅读本身。

缩 略 语

本书缩略语的使用规则:古典作品主要根据《牛津大学古典学辞典》(第二版)(*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期刊标题根据《古代文献检索》(*L'Année philologique*)及《耶稣时期(公元前173年—公元135年)的犹太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Time of Jesus Christ 173BC-AD135*)(1973—1979),犹太文献则根据《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书名通常采用全名。约瑟夫斯作品缩写:BJ(《犹太战史》)、AJ(《犹太古史》)、V(《自传》)、CA(《驳阿皮翁》)。

大事件年表

- 公元前 4 年 希律(Herod)死,其领土被分割。
- 公元 6 年 阿克劳斯(Archelaus)下台;罗马兼并朱迪亚地区(Judaea);奎里尼乌斯执行人口普查。
- 公元 14 年 罗马皇帝提比略(Emperor Tiberius)即位。
- 公元 26—36 年 朱迪亚行政长官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在位。
- 公元 33/34 年 分封王菲利普(Philip)离世。
- 公元 37 年 罗马皇帝盖乌斯·卡里古拉(Emperor Gaius Caligula)即位。
- 公元 40 年 希律·安提帕斯(Herod Antipas)下台。
- 公元 41 年 盖乌斯·卡里古拉皇帝被刺身亡;克劳迪乌斯一世(Emperor Claudius I)即位。
- 公元 44 年 阿格里巴一世(Agrippa I)离世。
- 公元 44—46? 年 卡斯皮乌斯·法杜斯(Cuspius Fadus)总督在位。
- 公元 46? —48 年 提比利乌斯·尤里乌斯·亚历山大(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总督在位。
- 公元 48—52 年 文迪蒂斯·古玛努斯(Ventidius Cumanus)总督在位。
- 公元 52—60? 年 安东尼乌斯·腓力斯(Antonius Felix)总督在位。
- 公元 54 年 罗马皇帝尼禄(Emperor Nero)即位。
- 公元 60? —62 年 波斯乌斯·非斯都(Porcius Festus)总督在位。
- 公元 62—64 年 卢西尤斯·阿尔比努斯(Lucceius Albinus)总督在位。
- 公元 64 年 约瑟夫斯出使罗马。
- 公元 64 至 66 年 格西乌斯·弗洛鲁(Gessius Florus)总督在位。
- 公元 66 年 战争爆发;加卢斯(Cestius Gallus)失败。
- 公元 67 年 尤塔帕塔(Jotapata)失守;征服加利利(Galilee);约瑟夫斯被俘。
- 公元 68 年 征服朱迪亚、以土买(Idumaea)、佩里尔(Peraea)。
- 公元 69 年 耶路撒冷的派系之争;罗马皇帝韦斯巴芗(Emperor